

第六章 結論

一、理論的驗證

本論文以瓦茨的新現實主義驗證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之變化，依據新現實主義理論中國際體系由大國形塑，國際體系的運作以大國的決策為主，中小型國家僅能依附於大國所制定的體系結構，假設美中關係為美中台三角關係之主變項，並以新現實主義理論從全球及亞太區域兩個層次觀察美中關係的變化。

在全球層次筆者以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觀察九一一事件前後美中在全球層次中關係的變化。在九一一事件前國際體系雖然維持「一超多強」的格局，但因為俄羅斯國力的衰退，中國大陸的崛起取代了前蘇聯的地位，在全球與美國抗衡，隱約出現新的兩極平衡體系，從新現實主義的理論來詮釋這是因為構體系中構成員的權力地位的重新分配，導致了國際政治體系的改變；另中國大陸雖然取代了前蘇聯的地位，但因其實力無法單獨與美國抗衡，必須藉由俄羅斯、歐盟等國際中的大國協助制衡美國，印證了新現實主義理論中構成員權力重新分配後改變體系，而改變後的體系反過來又影響了構成員的互動。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體系雖然並未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但國際體系中的各主要大國間的關係卻因為反恐戰爭產生了變化。美國藉反恐進行戰略布局，積極改善與歐盟、俄羅斯關係，甚至與俄羅斯建立了「新型的戰略框架關係」，結合北約東擴及歐盟擴張，將勢力伸入中亞，另外美國亦在南亞與印度、巴基斯坦改善關係，對中國大陸形成戰略包圍圈，九一一事件後各強權間關係的變化，再度印證了構成員權力和地位的重新分配，會對構成員的互動產生影響。

在亞太區域層次筆者以新現實主義理論中「權力平衡是必然形成的現象」觀察九一一事件前後美中在亞太區域層次的變化。九一一事件前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企圖以中俄同盟對抗美日安保，此一同盟關係在2005年8月中俄聯合軍事演習中充分表露無遺，另外中國大陸在2001年倡導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等機制及多邊組織，藉由推動、成立多邊組織及對話機制，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美中此一競爭關係在撞機事件達到白熱化，直接促成了美國對台灣的軍售。九一一事件後美俄關係的改善，對中國大陸欲藉上海合作組織鞏固中亞與俄羅斯關係以抗衡美國的企圖不啻是一項挫折，從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俄關係變化，可觀察到中國大陸企圖以中俄同盟平衡美日同盟，俄羅斯亦企圖以美俄關係改善平衡中國大陸的崛起，而

美國亦企圖經由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來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三者間的關係充分印證了不論國家是否有權力平衡的動機，都會採取有助於權力平衡的舉動，所以系統結構有向權力平衡情況發展的強烈傾向。另外美國藉反恐提昇美日安保的實質關係為「在全球脈絡下的美日聯盟」，並將第一軍司令部由美國本土調整到日本，同時美國在南亞、中亞的軍事部署，隱約已形成對中國大陸東西兩面的戰略包圍態勢，尤其是北京對美國與印度潛在的軍事同盟關係深感憂慮，因為此一關係若與美日同盟結合，美國即可配合亞洲兩大強權將中國大陸牢牢箝住。由此可知九一一事件前後的亞太地區主要的結盟行為仍是以美中兩國為主軸，在彼此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形成各種不同形式的合縱連橫，而這些的合縱連橫，只是亞太地區美中權力平衡的另一種風貌，美中在亞太地區權力平衡的角逐不會消失，只是轉換成某種型式而已，如兩手策略、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從美中雙方在九一一事件前後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與競爭，印證了瓦茨所說的權力平衡現象經一直存在國際社會中，只要有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努力在無政府狀態求生存，權力平衡的情況便會發生。

筆者認為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變化，印證了新現實主義結構體系及權力平衡的理論，唯值得注意是台灣角色似乎有脫離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約束，即小國應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2003年台灣的相關作為似乎在尋求自己的能動性，以擺脫美中兩強的束縛，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現象亦間接證明新現實主義理論結構的限制—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及單元行為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但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台灣陷入美中兩強間的雙緩衝國的困境，似乎反而證明了新現實主義結構理論的合理性，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小國僅能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任何溢出此一概念的作為將危及小國的生存安全。

二、研究發現

（一）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及戰略思維開始反映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架構

中國大陸於十六大後將大國外交列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軸，係因中國大陸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及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體系的合縱連橫中體會到國際秩序的形塑主要掌握在大國手中，與國際體系的主要大國搞好關係，有助於中國大陸國際地位的提升並提強化其影響力，顯示中國大陸已能接受西方新現實主義的思維，同時中國大陸亦接受了新現實主義中體系藉由社會化及相互競爭影響構成員的觀念，所以中國大陸積極的倡導、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如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參與亞太經合會、提倡東協加三成

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等，都是中國大陸受新現實主義思維影響的最好例証。

（二）中國大陸「聯美制台」政策的形成

新現實主義認為體系藉由社會化及相互競爭來影響構成員，從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改變亦可觀察到此現象。對於台灣問題，美國政府始終以台灣不獨中國大陸不武為基調，也就是不論兩岸的解決方案為何，前提必須是和平的手段，中國大陸則始終不放棄武力解決的方案，但在1996年此一政策有微幅的調整，即中國大陸體認到從北京到台北最短的距離是經由華盛頓。九一一事件後中國大陸第四代領導班子掌權，對於台灣政策則有著更大幅度改變，也就是尋求與美國共同管理台灣問題，換言之中國大陸似乎已經瞭解武力解決的不務實性，而尋求與美國共同處理台灣問題，此一政策改變詮釋美中對於台灣問題處理的社會化過程，即美國企圖影響中國大陸以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大陸受到美國的影響後，反而回過頭來尋求與美國共同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大陸在國際體系的社會化，影響了其對台灣政策的調整，也印證了新現實主義體系經由社會化和相互競爭影響構成員的理論。

（三）台海軍事衝突可能性降低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聯美制台」政策的形成，就是在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重蹈1996年飛彈危機的覆轍，在中國大陸軍事實力未大幅超越美國前，因為台海問題與美國衝突，將嚴重危及中國大陸政權，故中國大陸尋求與美國共同管理台灣問題，此一作法在2003年台灣提出公投制憲等違反美國利益的政治事件中發揮了功效，美國積極介入避免失控，在「聯美制台」的政策思維下，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降低，理由有三：一是藉由美國制約台灣分離主義比中國大陸直接介入有效，中國大陸的介入被視為對台灣的打壓亦會激化台灣內部的分離意識，但美國的介入台灣不能置之不理，二是中國大陸積極塑造和平發展的形象，以軍事行動對付台灣，有損其和平形象，亦不符其大國外交的政策，三是對台動武不可避免會與美日利益衝突，將使問題複雜化，且若美日介入，中國大陸並無勝算。綜合上述分析，在美中共管台灣問題的共識下，台海軍事衝突可能性相對降低，而中國大陸此一避免衝突的作為，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部份國際關係學者的觀點，即新現實主義是種守住權力維持現狀的「守勢現實主義」。

（四）台灣獨立自主的空間受到壓縮

九一一事件後的國際情勢使得美中關係獲得改善，對中國大陸言，在其實力尚無法單獨與美國抗衡之前有，通過反恐建構一個合作大於分歧的中美雙

邊關係結構，有利中國大陸之發展，同時亦可經由美國制約台灣內部的分離主義。在美中共同的戰略利益考量下，兩岸關係受到影響，其中對台灣最重大的影響是獨立自主的空間受到壓縮。這種壓縮可從二方面得到印證：

第一是小布希總統對台灣政策的改變，小布希總統在上任之初曾表示將不惜任何代價防衛台灣，並同意了歷年來最大規模的對台軍售，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台灣內部政權的鬥爭，企圖以去中國化、一邊一國及公投制憲等政治議題謀取政治利益，挑動了美中台三角關係中最敏感的神經，迫使小布希政府在一貫的「一個中國」、「三項公報」及「台灣關係法」的對華政策上加上了「反對台灣獨立」，正式將不支持台灣獨立列入美國的對華政策中，2005年小布希總統更將「反對台灣獨立」優先順序放在「台灣關係法」之前，顯見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已不存在台灣獨立的空間。第二是美國對台灣內政的干涉：2003年台灣提出公投制等議題時，美國一改以往態度，多次派人介入，並要求台灣派當時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赴美說明，同時對立法院長王金平傳話不要讓公投敏感條文過關，並交給陳水扁私人信函，要求在公投法表決時約束民進黨立委自制等，這些措施雖然是美國的預防外交，但亦顯露美國干涉台灣的內政。在美國強力的介入及干涉下，台灣的獨立自主空間大受壓縮，甚至陳水扁第二任就職典禮的講話稿都須先送華盛頓，充分顯示在美中共管台灣問題的共識下，台灣獨立自主的空間將受到壓縮。

三、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中國大陸的未來走向：

中國大陸外交及戰略思維已明顯的向現實主義修正，與中國大陸當初所謂走自己的路線已有所偏離，尤其是十六大後的大國外交政策強調做好大國關係，維護國際秩序的觀念，符合了新現實主義的結構體系的理論；另外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積極參與多邊組織如 APEC、博鰲論壇，與俄羅斯聯合軍事演習等，都是基於制衡美日勢力的考量，亦符合了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不論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權力結構如何變化，最後還是會形成權力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正嚐試逐步將美國勢力從亞洲排除，2005年召開東協高峰會將美國排除在外，就是一個例證，未來中國大陸是否會從新現實主義的思維走向攻勢現實主義的思維，值得觀察，如果中國大陸走向攻勢現實主義的路線，則美中衝突無可避免，台灣處境亦相對嚴峻，因為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一個國家只有追求權力的極大化成為地區霸權，確保沒有國家可以挑戰其地位時始可保障安全，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權力是手段，是

實現安全的手段不是目的，國家不是謀求權力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權力平衡是權力政治的最後結果，是守住權力維持現況的「守勢現實主義」，不似攻勢現實主義那麼具侵略性。中國大陸現階段實力不足所以採取「韬光養晦」作為，未來當其實力足以抗衡美國時是否會「有所作為」，值得持續觀察研究。

(二) 台灣在美、中兩強結構下的能動性

新現實主義從體系結構的觀點認為單元（構成員）在體系中的能動性受到體系中大國的制約，尤其是中小型國家更是如此，但這種觀點忽略了單元的能動性也排除了結構轉換和系統進程中單元能動的因素，事實上單元（構成員）在體系中仍存在某種程度的能動性，並非完全由體系所掌控。就美、中、台三角關係言，台灣並不全然必須依附在美、中兩強的結構下，台灣的國家定位（統一或獨立）在某種程度上對美、中、台三角關係結構仍具部分影響力，證明台灣並不是沒有能動的空間，只是能動到何種程度，此一問題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